

我在辛亥前后所接触的人和事

(一)

一九〇六年八月，我进广东黄埔陆军小学第二期时，才满十六岁。此时清政府正实行所谓“新政”，两广总督岑春煊又是当时在南方实行“新政”最有力的当权派。陆小招考第一期学生时，尚不为一般人所注意；到第二期，在“新政”影响下，风气所趋，报考人数达数千人，其中多为士大夫阶级的子弟，也有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。考场设在原来乡试的地方，足见清政府对此亦极重视。

我入校时，第一期同学尚未毕业，其中同盟会员仅有陈汉柱，何卓俦等人（何于二次革命时，被黎元洪杀害于汉口）。陈汉柱同我都讲“客话”，他经常向我宣传排满兴汉的思想，不久即介绍我加入了同盟会。因为我是广东客家族，而广州同盟会秘密机关的主持人，也多是东江客族（如邹鲁、姚雨平、张醜村等人），所以不久我就同他们建立了密切的组织联系。此后，我遇有机会，就向我所物色的对象宣传同盟会的革命宗旨。当时的宣传品主要为同盟会在东京出版的《民报》和谭嗣同的《仁学》等，还有《扬州十日记》、《嘉定屠杀记》等小册子。我常利用星期天，约新入盟的同志到山岗僻静处填写盟书（即誓词）。当时入盟的人甚多，且有一些富绅子弟，如李朗如为广州好几百年老店——“陈李济”如意油店的小老板，刘汉忠也是大商家的子弟。

在秘密机关里，姚雨平告诉我，我校将到任的新监督赵声，也是同盟会员，并说已向他介绍过我了。

赵声字百先，江苏镇江人，是由南京新军三十二标标统任内调来广东的。赵到校第三天，我就单独前往晋见，他毫不掩饰地用同盟会的“握手暗号”同我相见。我童年时随父读书（父为前清廪生）旧的东西给我不少影响。记得我同赵对晤时，曾涉及宋明理学家的言论，他听了立即正颜厉色地说：“中国的礼教，经过朱熹更是变本加厉，已成了吃人的东西。我们投身革命的人，对之应该深恶痛绝，万不能再受其毒害。”这好象是当头一棒，使我历久难忘。

赵生得身材魁伟，不类南人，长面竖眉，声音宏亮，眉宇间有一股威严之象，故大家称他为“活关公”。其时校内有一个学长（即排长）林震，亦同盟会员，因他的相貌生得与赵相仿佛，由于大家推重赵的原故，故对林也推重起来。赵不仅使全校师生倾倒，也受到新军的普遍崇拜。当时广州军人在各种集会时，都异口同声地夸谈赵声，开口“赵百先”，闭口“赵百先”，甚至有说成“我们的赵百先”。这种现象普遍流行于新军界，而以在燕塘新军的军官罗焯扬为最。彼时相交传述赵的轶事甚多。如说赵在南京任标统时，某日独游明孝陵，途中邂逅一人，见赵气概不凡，即趋前攀谈，问：“先生贵姓？”赵即以手指天答：“天”。其人再问：“大名？”赵复以手指地答：“子”，言毕即掉头不顾而去。这本是一种传说，但是大家因为推重赵的原故，津津乐道。赵在校中，对第一期学生甚感失望，他在公开训话时说：“第一期学生暮气沉沉，还不如第二期学生之有朝气。”他这番话对我

们同期同学有极大的鼓舞。学校的总办（即校长）韦汝聪，在性格、作风和思想各方面，都与赵形成鲜明的对照，韦重外表，讲排场，性格猥琐而庸碌，而赵则重实际，性情豪放，敢作敢为；至于政治思想，更如冰炭之不相容。因此同学们都爱戴赵而厌恶韦。某次校务会议，赵对韦竟戟指斥骂，使韦下不了台，结果闹到新军督办公署，赵由此辞职，后调任燕塘新军第二标标统。

赵离开陆小后，我与他仍有联系。我在白云山能仁寺养眼病时，介绍一个因闹学潮被开除的同学王鸾（同盟会员）同他见面，并请给王找出路。某日赵独游能仁寺（寺与燕塘军营毗邻，越一山岗就到了），适遇着我，乃共同漫步。时寺中有一和尚，俗名陆龙杰，为陆小第一期未毕业同学，因反抗家庭包办婚姻，愤而弃学出家。其时他正在廊下临摹颜鲁公法帖。赵见其书法尚佳，就坐下同他攀谈，得知其身世，立即成诗一首，写成条幅送他，诗为：

愿力未宏因学佛，英雄失路半为僧。

月明沧海归来日，万里蛮山一点灯。

接着，赵又榜书“宏毅”二字的横披送我。以后我每一杯念百先先生时，辄把这首诗和他在廉州海角亭（我的家乡）所赋“八百健儿齐踊跃，自惭不是岳家军”之句，还有他送皖北友人（即吴樾）北上那首诗，一起联系起来诵读，那首诗是：

淮南自古多英杰，山水如今尚有灵。

相见襟期一潇洒，朔风吹雨太行青。

在赵离陆小的前夕，我曾往晋谒，询及广州尚有何人可以联系，请予介绍。赵说：“现在广州的有朱太符（朱执信），其为人不才气见长，但有学有守，可以信托，你可同他联系。”其时朱在广州某校任教员，家住城内豪贤街，他领导的秘密机关，就在附近。此后我常到他家或机关汇报工作。某次在他的机关里，见他与其他同志正在商量利用某青年女同志（她也在座）化妆成卖身的女嫁娘，以饵某富翁（时富翁在另一室，我也看见），俟身价入手，即设法潜逃。足见当时同盟会筹备经费之难。在离朱家不远的天官里，有一幢楼房，是由朱租来供新军同志活动的机关。我因得朱的介绍，曾去过多次。此时，我曾因朱的介绍，结识了当时新军界中的另一杰出人物——倪映典。

倪映典为皖北合肥人，曾在安徽新军与熊成基等进行革命活动，已升任至管带（营长），后因有人告密，乃改易姓名，出走广东，仍投入新军。他在广东新军，初为见习官，后任排长，在军中有很高的威信，同时也是天官里机关的核心人物。倪生得同赵声一样，身体修长，具有一种刚强气概，虽不如赵声的魁梧，而英姿飒爽，一望而令人畏服，处世接物也处处表现出一种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态度。就我少年时所接触的人的印象而言，他使我终身难忘。我曾向倪介绍广西博白县的朱锡昂入盟。朱锡昂为广东高等实业学堂的学员，同我很相投，经我动员后，愿意入盟。当我带他到天官里去见倪时，说明他是来入盟的。不料在填写入盟书时，朱仅填他的别号“拭生”来代替本名，倪顿感不满。俟朱离去后，倪用极严肃的口吻责备我说：“你不应该把这种人带到此地来，象他这样顾虑多、缺乏勇

气的人，怎么能搞革命呢？”他又说：“象这样的情形，你应当先同他讲清楚，怎好这样孟浪呢？”我受了他的教训，感到难受，但从此对他更加敬佩。朱锡昂后来加入了共产党，大革命失败后，他在家乡博白县被国民党反动军队俞作柏部逮捕，旋即慷慨成仁。历史作了见证，朱并不是倪所说的那样人，但在当时残酷斗争的情况下，倪对我的责备是正确的，因我没有把入盟手续对朱讲清楚。

一九〇九年的旧历除夕，广州新军与巡警发生冲突。时倪已离开燕塘新军（因被告密而革职），经常来往于广州、香港之间，负责策划新军起义。当军警突然发生冲突，倪恐秘密泄漏，曾到香港总机关商量对策。当他匆匆返广州时，事件已经扩大，秘密已无法保持。在此千钧一发之际，倪只身驰入燕塘军营，适有管带漆汝汉，正集合士兵训话，意在弹压。倪突至，真象飞将军从天而降，全体士兵皆跃然而起。倪先发制人，立抽出手枪，当场将漆击毙。倪振臂一呼，群起拥戴，步、炮、工、辎各营约二千人，随倪整队出营，迅速占领了东门外钱局后的小山，准备攻城。时清军水师提督李准率队前来镇压，并派出倪的同乡管带童长标出来伪作和解。倪大怒，策马立阵前，晓以大义，慨慷激昂，敌军闻之亦为之动容。敌乃乘时发炮，倪被击坠马下，为清军俘去，最后大骂不屈而死。

此后不久，我在陆军小学毕业了，升入南京陆军第四中学。时赵声已离新军，住在香港的时候居多。我在南京，从与赵及广州有关方面通信中，对南方情况仍时有所闻。一九一一年春，我知道从海外，特别是从日本、南洋一带回香港来的人甚多，这是一种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的征候。我断定广东将有新的举动，故向学校请了十几天的假，托辞回南省亲。行前我又写了一函致赵声，说我就要回来了。我到香港后，刚下船即驰往赵处，见赵着日本和服，高踞桌上，同围着他的人高谈阔论；这些人也看和服，一望而知是刚从日本回来的。经赵介绍后，知为福建的方声洞、林时埭、李文甫等人，是回来参加起义的。赵随即对我说：“你的信我已收到了。”我说：“我回来是要求参加起义的。”赵带着严肃的口吻说：“你们军官学生，是将来革命的种籽，以后推翻满清，掌握军队，全靠你们这一批人，怎好轻易牺牲呢？况且这次起义，成功与否还不可定。你赶快回去吧！”我见他态度严肃，语气坚定，故未便坚持，旋说：“我请假的期限还未到，我想进广州去看看情况。”赵同意后，当天我进了广州，在秘密机关会着姚雨平等，他们也催我赶快回学校。我住了一夜后，次日到港，又逗留了两三天。当我乘船抵达上海时，刚登岸，打开当天报纸一看，知道广州发动的起义，于昨日（三月二十九日）遭到失败，牺牲的同志甚多。这个噩耗，有如晴天霹雳，使我万分惨痛。

是役失败后，赵由顺德经澳门转回香港，旋即大病，不久即逝世。闻其将死时，曾吟“出师未捷身先死，长使英雄泪满襟”之句。我自闻百先先生之死讯后，每与同志们诵王夫之《读通鉴论》中“老成凋谢，后生罔识，向慕之忱，日远日亡”之句，辄相对怆楚。这不仅是因他的革命言行感人至深，实因他早丧，乃革命之一大损失。

不久，谭人凤来南京看我，谈及起义失败经过。谭非常激动地破口大骂胡汉民的弟弟胡毅生，说他负责指挥的那一路，根本没有发动起来。谭对其他好几路的负责人，亦有责

难，对姚雨平本人，也很不满。

自此次失败后，孙中山先生仍在海外积极活动，黄克强先生将同盟会机关迁到上海。总机关以黄为首脑，下分五部，其中负责组织的陈英士，负责交通的谭人凤，都到南京同我见过面。

其时，我在南京陆军中学，仍积极从事同盟会活动。开始时，对外联系全由我负责，后以会员增多，如四川的吕超，福建的金仲贤、吴兴五，江苏、安徽、江西等省的人亦有，又增加任鍼（任援道）与我共同负责对外联络。

同年八月十五夜（旧历）谭人凤突然到南京，约我到他住的旅馆相见。他谈到立即要去武汉，因为武昌同志将发动新军起义，总部认为各方面的部署还未就绪，此时不宜轻动，故他奉派前往劝阻。谭十六日乘船西上，计算行程，尚未抵达汉口，而武昌新军首义的旗帜，已飘扬在黄鹤楼的上空了。

（二）

武昌首义的消息传到我校后，全体同学除旗人外，都兴高采烈，喜形于色；不论是否为同盟会员，都争着买一角钱一张的报纸来看。同盟会员立即行动起来，连续开会，准备乘机响应。时我们已届毕业，经常使用武器作野外演习，并练习实弹射击。大家都注意在礼堂后面的武器库（平时学校将械弹集中贮藏），并立即派人轮流昼夜监视。时学校当局因慑于武昌首义对同学们的影响，趁我们熟睡时，偷偷将子弹运走。我们发现后，顿失所望，乃齐集围墙内的菜园里开会，一致认为，子弹既运走，已成赤手空拳，留在南京，已属徒然，故决定齐赴武昌，参加战斗。大家公推我到上海，向总部请愿，并请拨给旅费。在我动身前，我校的法文教员林知渊（同盟会员）已先往上海，他留下上海住址，嘱我到时即往联系。因我已决心退学，故未办请假手续，悄悄越墙逃出学校，当日下午上车，晚上到了上海，随即到林知渊寓所。林说：“你来得正好，宋渔父（教仁）今晚就要上船前往武昌，我们马上去见他。”我们立即驰往宋处，刚进大门，见宋已挟着一个大皮包悄悄走出，一望而知是出远门的样子。就在门口，先由林介绍，我即表明来意。宋问：“你们共有多少人？”，我答：“大约有四五十人。”宋就在皮包内取出钞票一叠给我（共五百元），又说：“南京方面的事情，已派柏烈武（文蔚）负责，你可同他接头。”同时嘱咐林带我去见柏。宋同我们谈毕，即匆匆前往搭船去了。次日我同林去见柏，他深不以我们去武昌为然，我一再向他解释，柏始同意。我当天下午回南京，即在车站附近小旅馆里，约同学出来开会（此时我已被学校开除了学籍）大家商定，分三批前往武昌，第一批由我率领，同行者有李章达、蒋光鼐、李伴奎、范其务、陈果夫（江苏陆小学生，参加我们的组织）等十余人，其中也有非同盟会员闻风参加的。

我们搭船抵汉后，即过江径到武昌，向都督府报到。时清军援兵已开抵汉口，占据了京汉铁路的刘家庙车站（即循礼门）、硚口等处，与汉阳兵工厂仅一河之隔，情势颇为紧张。我们都热情高涨，刚到不久，就要求过江去保卫兵工厂；经过都督派员劝阻，仍无效。

后接到命令，收我们编为中央第二敢死队，由胡瑛（日知会负责人）集合第一、第二两个敢死队的队员训话，大家都以为他是总领队。时胡刚从监狱出来，背上还拖着一条大辫子，在灯光下看见他满面胡须，形容憔悴，讲话声音虽不洪亮，但却清劲，同学们都很受感动。接着领枪枝子弹，闹到深夜始就寝。翌晨集合出发，由平湖门登船至汉口龙王庙上岸，顺着黄陂街转入后城马路，继续前进。我先头部队到达自来水塔（现为中山路）附近时，即发现占据循礼门之敌，用机关枪向我们扫射。我们即将队伍散开，用步枪还击，相持约半小时，无法前进，因水塔前是一片水田、湖塘，运动极感不便。到了夜晚，仍由领队率领我们回到武昌。是役有浙江同学王卓阵亡，广东同学范其务负伤。此时，有些同学感到打这一仗，没有甚么意义，但也说不出甚么道理。事后听都督府参谋人员说，因我们初到，就坚请到汉阳去保卫兵工厂，经劝止仍无效，故特下此命令，一来安定我们的情绪，二来让我们尝点打仗的味道。

十一月三日，黎元洪在武昌阅马厂筑坛拜黄克强先生为革命军战时总司令，我q奉命随黄到汉阳（因黄知我们是南京陆军中学生，志愿来投效的，感到很喜欢），驻扎在昭忠祠的总司令部，随即改编为学生队（带有督战性质），直属总司令部。此时，由南京来的第二、三批同学，也相继到达，连第一批共达一百余人，其中有曾任广东陆小学长、继任南京讲武堂教官的张我权和任南京陆中学长的徐源泉（均非同盟会员）。在编队时，同学原拟推我为督战官（队长），我感到不适宜，坚推张、徐二人分任正副队长。同盟会会务仍由我负责。在学校时同我一起负责会务的任鍼也一起来了，但他刚到就脱离组织，第二天就找到门路，当了都督府某部科员，曾引起同学们的物议。此人后来曾参加过邓演达的第三党，最后终于坠落当了汉奸。有一部分人慑于水塔一役同学中的伤亡，知道打仗不是儿戏，有些胆怯，另一部分人听到湖北陆军第三中学的学生，多当上了都督府各部科员，看了有些眼红，故不愿意当学生军。此事曾经黄总司令亲自集合劝说，但仍无效。最后只得发给路费，让那一些人搭船东下，各奔前程。坚决不走的约有五十余人，仍继续留下来。

几天后，由湖南开来一师湘军。总司令下令，在汉阳琴断口搭浮桥渡过汉水，向敌展开进攻。开战时（旧历九月廿七日），俟湘军向前展开后，学生队亦跟着前进，向右翼延伸。当时，黄克强先生骑一匹骏马，握着一柄雪亮的指挥刀，在张公堤上往来驰骋，指挥着军队前进。我们的队伍刚越张公堤后，敌军即用猛烈的炮火阻止我军前进。我们在水田内散开，前进到一村落时，就地休息，预备造饭。因我们前一晚由汉阳出发，行军一整夜，至拂晓始渡过汉水，接着又继续前进，至此还未吃饭。正于此时，忽见左翼的湘军纷纷后退，翻过张公堤向襄河方向退却。我队因受友军影响，亦跟着向后撤退。刚退至搭浮桥的地方——琴断口时，看见河滩上一片密密麻麻的人群，队伍争先恐后抢渡。因为人多，浮桥挤断，许多士兵落水，被河水冲走。幸而此时据守铁路线之敌，未继续追击，否则我们将全军覆没。其时我们学生队也溃不成军，经过相当时间才集合起来，陆续由小船接运，渡过浮桥，先后回汉阳归队，查点人数，尚无损失。

经过此次战斗，敌已侦知我军强弱，故不久即在蔡甸搭浮桥渡河，向汉阳进攻。我军

即在黑山（即扁担山）一带布防抵御。学生队亦奉命参加，先一日开往黑山附近，当晚在琴断口宿营。翌晨拂晓，敌已到琴断口小河对岸，双方隔河对峙。我队旋奉命增防右翼，相持半日，弹药告罄，给养也补充不上来。先是左翼友军向后撤退，而我们最右翼也因一挺机关枪弹尽而向后转移。此时，我队除了派出抬伤兵，领弹药和催给养的人员而外，实际担任战斗的仅二、三十人，势孤力单，也只好沿着袁河右岸，经梅子山撤回汉阳休息。此后，我队曾在梅予山、龟山协助友军担任防守任务，但与敌未接触。十一月下旬，在汉阳已听到由前方传来清晰的枪声。驻在晤忠祠的总司令部人员和设在归元寺的总粮台，以及架设在龟山的太炮，都纷向武昌转移。我军亦随着过江，到武昌集中。此次撤退，各部都极形混乱。

撤到武昌的次日晚，宣布黄总司令立即回上海，听说是黄与黎元洪会商后决定的。就在当天晚上，我队一部分同学奉命随黄到上海，立即到汉口租界上船。同行的有黄的夫人徐宗汉，广东女同志张竹筠，日本志士萱野长知等。留下的一部分同学，则随都督府所属机关，移至青山驻扎（此一部分同学到汉和停战后，始离开武汉，各寻出路）。当我们登上轮船时，遥见汉口仍火光烛天（两日前，清军已开始纵火）。事后得知，汉阳亦于此时相继失守。

我们随黄克强先生抵达上海时，上海已为光复军占领，陈英士任沪军都督。我们起初驻扎在北火车站附近的南海邑馆，黄本人则住法租界内，我们轮流到黄的寓所守卫。大约经过了半个月，姚雨平由广东率领北伐军到了上海（其先头部队由林震率领，先已开抵沪宁线，并参加了收复南京之役）。时姚任北伐军总司令，邹鲁为军队的经理局局长，邹见我立即委我为该局委员，而姚部的营长刘某则要我作他的连长。我自以带兵为宜，故接任了连长职务，而经理局委员名义则仍保留。

十二月二十五日，孙中山先生在举世瞩目中到了上海，全体同志均极感振奋。次年（一九一二年）元旦，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，黄克强任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。就在当天晚上，姚雨平率领北伐军中的同盟会员多人到总统府祝贺，我随同入府。孙中山先生神采奕奕，亲切地同我们握手交谈，并致慰问。因姚是客族人，孙亦用客族语言同他交谈，仿佛家人闲话，倍感温暖。

时清军前南京守将张勋撤过江北后尚在铁路沿线逡巡，北伐军奉令过江追击。我军过江，进驻安徽凤阳县城休整。时我连有一士兵，因违犯军纪，被团部枪决。这一事件团部处理失当，这一士兵的叔叔（在机关枪连任班长）从中鼓噪，遂扩大成了风潮。后经上级疏解，以营长作为孝子送葬，才算了结。我虽未被牵连，但亦深感没趣，乃自动辞职。获准后，我即回到经理局报到，当奉派到滁县前线兵站随军工作。此时，知道全军的给养都是广东供应的，其中食品一项，全为英国出品的肉类罐头，数量极多。足见广东后方，当时对北伐供应之丰富。不久，我军进驻蚌埠，清军退据固镇一带，阻我北进。在此激战一日，敌不支，退守南宿州。我军在固镇略为整顿，即跟踪追击，又击败敌于宿州附近。敌节节挫败，退守夹沟，迨我军追至时，又望风而逃，退守徐州。至南北议和告成，敌军退

至山东韩庄，我军乃进驻徐州待命。是役为时约一个半月，我军一月中旬由南京出发，二月下旬进驻徐州。

在此期间，孙中山先生辞去大总统职务，由袁世凯继任。黄克强先生免去本兼各职，改任南京留守府留守。宋教仁、陈英士等均任总长。北伐军在徐州驻扎了一个多月之后，开回南京训练，不久改编为陆军第四军，姚雨平任军长，而罗炽扬则仍任高级将领，林震任参谋长，张我权亦不次擢升，继林之后任军参谋长。罗、林、张等数人均夤缘时会，数月之间，竟飞黄腾达起来。其时军中也有这样一部分人，他们的共同想法是：革命已经成功，个人何必拥兵自卫，徒耗国币。竟有人联名致电北京国务院，请求解散队伍，官兵解甲归田。这个队伍以后仍调回广东，不久被胡汉民遣散了。姚雨平自军队解散后，即以以上将衔的官衔在上海作寓公，旋又被罗炽扬拉进北京。罗于北伐军被遣散后，即入北京投靠袁世凯，并为袁作说客，使一些人失足。林震自北伐军被遣散后，曾任广东陆军速成学堂（即以前陆小第四、五期改的）的总办。二次革命失败后，林曾亡命日本，后为其兄某（广东省议会议员）函招回国，主要仍由罗炽扬牵线，向袁自首（袁曾颁布有民党自首条例），在北京做了月薪三百元的参议。张我权在二次革命时，即公开背叛革命，在龙济光未入广州前，曾因勾结驻在燕塘的熊团炮击督军署，逼走了陈炯明，还代理过七天都督。我联想到安徽的孙少侯，他是老同盟会员，且精研佛典，早负时望，亦以晚节不终，依附袁世凯，但言维护帝制，以至声名狼藉，抑郁而死。

我随北伐军回南京后，跟着离开了军队。当时有两个前途任我选择：一为到外国留学（去日本或法国），一为进保定军官学校。我选择了后者，而将留学的机会让与同学谢婴白（谢顶替我的名字，进了日本早稻田大学，后谢曾任张发奎的参谋长）。自我进保定军校第二期不久，国内发生了许多重要事件，如黄克强先生辞去南京留守府留守，国民党四内閣阁员（王宠惠、蔡元培、宋教仁、王正廷）相率辞去总长职务，尤以宋教仁被袁世凯刺杀一事，引起了国民党全体同志的愤怒，加以袁进行“善后大借款”，未经国会通过，即行非法签字，于是群起进行反袁运动。

（三）

国民党人进行反袁运动时，在保定军校的多数同志，几经秘密集会，决定到江西去参加李烈钧酝酿的江西起义，共有同学蒋光鼐、季方、吴艺五等三十余人。正要出发时，我接到邹鲁由香港来信，要我回去发动关仁甫的民军（关为广东地方武力首领，曾与黄和顺一起参加过镇南关起义之役）。我觉得很有意义。临时变更计划，只身南返。其余同学仍按计划到江西，参加了林虎首先发动的湖口之役（以后讨袁失败，我到上海曾与蒋光鼐等多人会面，而与其中的一部分人亡命日本）。我到香港同邹鲁晤面后，立即进广州，会着朱执信。我把计划告诉他，他很着急地说：“广东的民军很难搞，特别是关仁甫最靠不住，你千万不要上当。”朱过去曾搞过民军，对此情况十分熟悉，我接受了他的意见，暂在广州留住下来。

正在这几天里，广州发生了兵变，就是前文已提到的张我权主谋搞的。当叛兵炮击军督署时，我适经其地，曾被破片击伤。接着，我遇着陈雨亭（也是同盟会员，会制造炸弹），同他密谋制造炸弹，俟龙济光入城时，实行暗杀。我们曾在郊外作过试验。不料在龙入城的前一天，全市施行戒严，我就在住的客栈中被捕。我的日记本中有其他同志给我的陈炯明逃新加坡的通讯处，幸而写的是陈的代号“柯先生”，我坚称是我的舅父的地址，才得搪塞过去。当日我同其他被捕的人都被带上脚镣、银铛入狱。经过四五天，传闻陈炯明在出走前留下做内应工作的前警察厅长陈景华，因同陈炯明秘密通讯事泄，被枪决。我闻之，忐忑不安。后来我侥幸被释，一方面是因为查不出有力的证据；而另一方面，那个军法官在两次审讯时，好象处处都在为我开脱似的。最后我还是经我的同学李朗如，由他家的“陈李济”药店保出来的。我被释后，立即搭轮到了香港，会着邹鲁等人。他们都说：“我们已准备好到督署照壁前（刑场）来收你的尸哩！”并悉他们已运动好陈景华的旧部和宪兵，准备实行兵变，攻打监狱，把我救出来。在此，我联想到，我未入保定军校时，曾在上海与一老同盟会同志陈子范（福建人）结识，他是在上海“打洋工”（海关作事）的，会制炸弹，专搞暗杀。他与我及几个福建同学（如金仲贤、吴艺五等四五人），便无形中成了一个小集团，每人都有手枪一支（我的枪还带进了学校，在此次回广州时，才交还了陈子范）。在此以前，大家都深受俄国虚无党的影响，并羡慕徐锡麟、秋瑾的英勇行为。即如恂恂然有学者风的蔡元培，当时也曾倾心于暗杀活动，暗杀在当时已成为一种风尚。自宋案发生后，驻在扬州的陆军第二军军长徐宝山的被炸毙，事后得知，就是陈子范搞的。

我到香港后，国内形势急转直下，各省在袁世凯的威胁利诱下，纷纷取消独立，革命进入了低潮，革命党人在国内已不能立足。于是我决定到上海约同吴吉甫、吴艺五等七八个同学（方声涛也同行）一起亡命日本。我们由上海动身时，大约在一九一三年的年底。

（四）

我们到日本时，孙中山先生和黄克强先生以及其他重要骨干，都云集东京。我们一行先在东京租一间房子住下，生活费用由我按月在黄处领取，有时则通过李根源之手。从四面八方来到日本的同志，文的武的都有，在此革命新受挫败之余，大家都感到有重新学习，重振旗鼓的必要。经过一番酝酿，黄即委托殷汝骊主持其事，先成立军事学校，设在东京郊外的“大森”，把“浩然庐”作学校的代名，后来都叫作“大森浩然庐”。殷汝骊为浙江人，老同盟会员，辛亥革命后，曾在北京做过财政部次长，后被袁世凯以贪污案为名下令通缉，逃到日本。浩然庐共有同学近百人，虽均是各省同志中的军人，但不少的人都受过旧教育，且沾染了一些旧文人的习尚。如四川的吕超，除了处处表现其英雄气概外，并喜欢为人题字，嗜好下围棋。陕西的徐景翼除了能打一手极好的“猴拳”外，还能写一手娟秀的十七帖；最使人感到兴趣的，是他能把老子的《道德经》倒背如流，不差一字。我同他二人气味相投，故在校时来往最密切。大森浩然庐的同学、有李明扬、江炳灵、吴艺五、殷公五等人。学校聘请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退职军人担任讲师，而以日本士官学校的

中国留学生任翻译。数月后又成立政法学校于东京郊区，学生多为同志中的文人，以现任日本大学的教授担任讲师，殷汝骊和殷的弟弟殷汝耕同任翻译。在政法学校学习的，有仇鳌、易象（田汉的舅父，后为赵恒惕杀害于湖南）等，其中尚有湖南的名士多人，甚为活跃。两个学校的经费来源，都是黄克强先生交给李根源转发的，殷汝骊同我接近，彼此无话不谈。他的胞弟殷汝耕在校时，同学们对他的印象不好。殷汝骊曾沉痛地对我说：“我这个弟弟品质极坏，只要利之所在，他将来不仅可以出卖朋友，而且可以出卖民族”。他的话说中了，殷汝耕后来真当了汉奸。殷汝骊后来同我先后回国，在广东肇庆成立军政府时代到了广东，曾到琼崖考察过，写成《开发海南岛计划书》一册（曾由神州国光社出版）。殷在抗战初期，辗转由香港回国，病死在重庆。

我们在大森浩然庐学习了几个月之后，孙中山先生在东京将一九一二年八月改组的国民党改为“新中华革命党”，而以陈英士等人为主要骨干，规定所有以前的老党员，都必须重新办理入党手续，并要在入党书上打下手印。我当时知道，黄克强先生对此曾有意见，他没有参加这个组织，但也不反对别的同志参加，也没有另行组织，而与黄较接近的多数人，如李烈钧、林虎、方声涛等也没有参加。同我最接近的吕超、胡景翼等人都参加了，他们参加后随即奉派回国。吕超回川进行军事活动，最初曾搞得有声有色，失败后入粤，任孙先生大帅府的参军长。当我率领的地方队伍正式奉编为粤军一师第四团时，他曾带我晋见过孙先生，我与他关系历时最久。胡景翼回陕搞军事活动，颇有成效。孙先生逝世时，我正参加第一次东征，曾于汕头军次接到他一封极沉痛的吊唁孙先生的信，可惜他早死了。因我与黄兴方面的关系较多，同时也没有回家乡进行活动的有利条件，故没有参加新中华革命党，也不打算急于回国。故我此次在日本的时间，较之其他同志要久些。自大森浩然庐结束后，我又到政法学校学习了一个时期。此时，我除了与同志们之间有联系外，还认识了若干其他派别的人，如当时号称“国会议员派”的张耀曾、彭允彝、欧阳振声等。至于新中华革命党方面，同我较接近的仅有当时在陈英士左右的黄郛。当时在日本的国会议员诸人，都是曾因各种不同的情况，同袁世凯闹翻后而逃到日本的。他们在反袁问题上，同孙、黄基本是一致的，但对国内政治主张，却不相同。我当时只知道这些人是号称“温和派”的，他们同黄这方面的关系则较接近。我之所以同这些人发生关系，是由于与黄的关系较深的原故。当时既然有所谓“温和派”，自然也就有所谓“激进派”，而新中华革命党自然就是当时的“激进派”了。黄在两者之间，自然也就成了当时的“中间派”。这种“左”、“中”，“右”的形成，在当时的确是存在的。

据我当时了解，孙、黄二人之间的关系，总的说来是好的，过从甚密，但也不能说他们两人没有分歧，具体表现在：第一、黄不参加新中华革命党（打手印一事，曾引起一些老同盟会员的反感）。“民元”间的国民党改组，是黄同宋教仁发起的，虽仍奉孙为总理，黄则被推为副理，实际上与孙同为党的领袖（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后，孙先生曾奔走各国，黄代总理，常住东京）。现要黄打手印来履行入党手续，在黄的思想上是通不过的。第二，陈英士等人曾以黄辞去南京留守府，以及后来退出南京（讨袁时，黄在南京任总司令）二

事，对黄攻讦，而黄始终涵忍。第三，在政治主张上，从民族、民主革命的要求上来说，孙、黄是一致的，但孙还有一套“平均地权，节制资本”的经济政策，是黄所没有的，当时多数人都没有接受这一套主张。第四，黄所接近的人，多是出身士大夫阶级，以文章气节相标榜的人，而孙在用人方面则兼收并蓄。孙为了革命，曾用尽心力来争取一切可以利用的人。尽管孙、黄二人之间存在如上的分歧、差别，但他们仍互相爱护、互相尊重，直到黄死，都始终保持着这种可贵的革命友谊。同时，有些同盟会的老同志（如李根源就是其中之一）和若干爱国华侨，一致认为孙、黄分家，对革命前途大为不利，因而从中斡旋，为他们的紧密合作作过不少的努力。事实上，不到一年，大家都在国民党旧的名称之下，统一起来了。

一九六一年六月

本文原载《文史资料选辑》第七十五辑